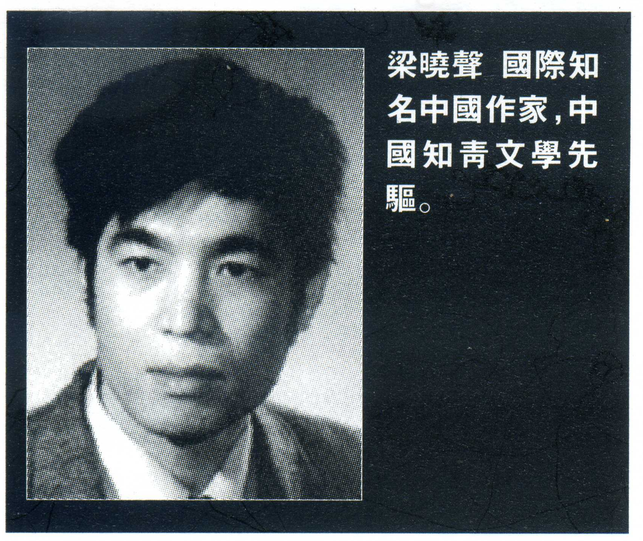
梅娘（原名孫家瑞）四十年代以“南玲北梅”和張愛玲齊名的國際著名中國女作家

張愛玲 (1920-1995) 被傅雷稱爲“一口古井”的國際著名中國女作家。



梁曉聲 國際知名中國作家，中國知青文學先驅。

比政治高級。這個，大于小于没有什麽意義。因爲政治是很大的，它可以殺人，文學没有那麽大，因爲文學不能殺人，衹能被殺。因此，文學并不大于政治。可是，文學，遠遠高于政治。我們不屑于變爲一種政治的爬蟲，就是因爲它太醜陋，太低級，太俗氣，不配進入我們 -- 就是這種以詩歌的名義在説話的時候相提并論。因此，詩人不是不可以承擔政治責任，就像我寫《惡夢的靈感》，或者我下一個在瑞典的發言，題目叫做《追尋作爲流亡原型的詩》。當然這個句子稍爲有點拗口，但是，詩的性質已經注定了這種流亡的現實。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流亡的原型。我们只有在把政治這種東西，納入到我們的詩歌思維中間的時候，它才是值得討論。否則，我衹需要，在抗議書上簽名。如果要和詩相提并論的話，我衹有把它作爲詩的某種背景，某種出發點，或者某種反襯來對待。但，我認爲它太低，或者太低級，不值得在詩中呈現。政治這個東西在西方有非常廣泛的含義，不衹是個人和權力之間的差别。因爲還有例如像環保呀、種族呀、包括語言呀、少數民族的語言呀 -- 中文實際上是一個邊緣化的語言 -- 少數民族的語言，在世界上不占份量的語言。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因此，堅持用中文寫詩，寫好詩，而且寫不僅是能够跟别的人能够在一般意義上對話的詩，甚至能够給世界提供某種啓示的詩，這本身就是政治。這本身就是一種個性的態度。就是對某種語言强權的一種態度。對不對？所以，這個政治的含義，反而在中國它擁有某種特定的含義。這個含義也可以包括在我們的政治態度之中。但是，其實一個詩人承擔的政治的責任，又遠遠大于那一點，我認爲更深更廣。可以説包括所有對現實的態度。每分每秒的，你對于一個打掃衛生的女工的態度也是一種政治。可以這樣談。你比她高，也許還更難保持平等。

七 批評的態度

川：你看過國内那本名字叫着《十作家批判》的書嗎？

楊：看過。

川：這本書從錢鐘書、賈平凹到近年的散文家餘秋雨，都有些批評，但我認爲對梁曉聲等人的批評，特别涉及知青部分有些説法違背歷史事實。當然，批評和敢于批評，在中國，在今天是應當提倡的，但要多講道理。

楊：對于國内的情况，總的來説我比較反感這種類型的批評。因爲很明顯，從這個書名就可以看出這是一本商業炒作的書。它的目的是爲了賺錢，而不是爲了批評。我們現在經歷了從 81 年到現在 20 年啦。過去，八十年代初，或者説七十年代末，那種非專業、并不深入到文學作品文中的、那種從文學之外對作家加以各種各樣的指責或者故意找出一些名人的瑕疵也好，缺點也好去炒作，目的爲了在于罵名人賺賺錢，或罵名人出名的這種東西。第一我們已經見得太多啦，但在文學上没有什麽意義；第二，對中國文學是一個巨大的傷害，它使市場上充滿了這種 ---- 就是非文學性的討論，而當我們真要想在中國文學裏，這個不僅是每一次從零開始，而且一直有所積累的，在思想上能够有所把以前比較好的學術、包括思想的東西作爲一種新的出發點、新的起點，不停的向更高級的地方發展的這樣一種狀態，就是説，如果我們不是想要把這樣一種狀態破壞掉，而是需要去建立那樣一種狀態的話，也説得簡單一點，讓中國文化能够真正重新開始一個自己的、當代的、有創造性的傳統的話，我們要做的事不是這一類。所以，本人，從我的角度來説，我覺得，这样一种，或者哗众取宠的方式吧，对中国文学或文化或思想，有害无益。

川：我感覺就像我前面説的，我的意思是説：批評和敢于批評，在中國，在當今，尤其是應當提倡的，但要多講道理……

楊：當然，我的前提肯定是，這些人不是説不能批評。比如説，我對北島的詩，我也有我的看法。他的，比如説重復，或者某些空洞，或者説某些造句的方式，那種太簡單的等等……。但是這些東西我們要進入到文學之内去討論。我也看過一些非常好的批評北島的文章。比如説，一個叫江若水的，在《創世記》上曾經寫過的一篇文章。寫得是非常專業，進入到文學本身去討論了。文章批評得非常到位。而且極其讓你覺得心平氣和。我們就更需要這樣一些文章。你把這樣的兩篇文章很簡單地放在一起，你會清清楚楚地看出什麽是建設性的，什麽是嘩衆取寵。

川：我感到裏面對梁曉聲的批評有些過分。一個人也好，一個作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它的發展都有一個歷史過程，你不能説好像你把他的以前的東西全部否定掉。你用它後邊的東西去否定它的前面。我感到這樣顯然有些不客觀。去年我和莫言也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説是一個名人當其你成爲一個名人的時候，就應該附帶在身上的，誰叫你那麽有名？我認爲，作家爲什麽一定要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就象一個演員和他表演的角色之間一樣，藝術品的藝術成分和藝術品制作人的道德之間究竟有多少必然的關系？黄世仁是不是一定要壞人去演？楊白佬是不是就必須是好人演的？我看，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面，每個人都有做壞事的時候。這個人就包含了作家這一類人。當然，這個比方也許不太貼切。梁曉聲是中國的“老三届”知青一代，你我也都下過農村。實際上，這一代人是衆所周知被徹底犧牲了的一代人。就是説，從他們一出生到了這個世界上就是灾難連連不斷。在他們從童年、少年、到談戀愛、結婚、生孩子。從他們開始長身體、長知識到工作，他們總處在各式各樣的什麽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等等灾難的殘酷打擊之下。好不容易從農村弄回城裏工作，工作了一段時間又遇上下崗。他們是如此之苦，但是一些比他們更老和更小的人却因他們處在文革中，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文革中紅衛兵的一切罪過加在他們頭上。我曾經在一首名爲《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裏面表